

蘇聯的遠東關係

Harriet L. Moore著

曹未風節譯

(1931—1944)

商務印書館發行

蘇聯的遠東關係

Harriet L. Moore 著

曹未風節譯

(1931—1944)

商務印書館發行

譯者序

赫里脫·摩爾女士是美國人，是太平洋學會內的蘇聯問題專家。在美國，蘇聯問題專家，尤其是關於遠東方面的，是很少的。

這一本書在一九四六年出版。先一年的夏天，重慶美國新聞處處長賀蘭德拿了一份校樣給我，希望我把它介紹給中國關心蘇聯遠東關係的朋友們。於是就在那炎熱的山城裏，開始把它節譯。所以節譯，是因為當時的出版條件是很困難的。

在遂譯未完的時候，蘇聯對日宣戰了，緊接着日本也投降了。我因為離開重慶也就沒有能把它節譯完。

其後，中蘇友好協定簽訂了。國共談判，協商會議，開而復停，停而復開，我一直沒有繼續這本書的節譯工作。世界、國家同個人的事都在亂七八糟的狀態中拖着，到一九四六年冬天，一切似又歸

於看不出眉目的情勢中，一時無它事可做，還是把它節譯完罷，於是就產生了這一本小冊子。在今
年三月由文匯報開始連載，到五月初載完。

從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起到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之日止，由於我們的國策，關於東北（所謂「滿洲國」）的事，我們的知識，差不多完全是一片空白。尤其是蘇聯對日「滿」在那邊的所
做行為，我們可說是完全無從知道。這一本書恰好為我們補起了那一片空白。尤其可貴的，如摩爾
女士在她原序裏所指出的，這裏所用的材料全是由俄文直接取用的。

這裏所說的事，自然已因局勢的變遷，完全成了陳述，但是對於未來的發展，與對於研究遠東
國際關係的人們，這一本小書，還不失為有重大參考價值的。

譯者（一九四七年十月）

目錄

譯者序

第一章	一九三一年之蘇聯	一
第二章	九一八事變	四
第三章	中東鐵路之出售（一九三三——四三年）	一五
第四章	邊境及漁業糾紛（一九三五——三六年）	二九
第五章	由中日戰爭到歐洲戰爭（一九三七——三九年）	四八
第六章	戰時蘇聯（一九四一年六月以後）	七七
跋		

蘇聯的遠東關係（一九三一——一九四四年）

第一章 一九三一年之蘇聯

在一九三一年時，蘇聯在國內與國外的地位都才漸漸的鞏固起來，在那年三月召開的蘇維埃代表大會裏，各種報告都著重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前三年的成就上。莫洛托夫是當時人民委員代表大會的主席，他報告說，雖然經濟方面的社會資本終於壓倒了新經濟政策施行以來的私有資本，而農業方面的集體化還剛在開始，他解說了曳引機站的作用，同時還通過了繼續以機器及肥料供給加入集體農場的農民的幾個提案。第二次五年計劃裏的工作重心在那時才露端倪。他演詞的下半部則專談對外關係。一九三一年時，許多受恐慌打擊的工業國家都在拚命的喊道「蘇聯在傾銷」。莫洛托夫針對着這個不憚繁複的一再申說蘇聯當時的國際貿易情形還

遠不逮帝俄時代，而蘇聯乃是當時唯一增加入口的國家，所以蘇聯不但對於世界經濟無害，而且還正在大有助於促進繁榮。然而蘇聯與各大強國的關係不見起色。惟有德義兩國正在考慮對它長期放款。

蘇英的邦交於一九二七年斷絕之後，到一九二九年才重新恢復，但是英國的報紙對蘇聯還是攻擊不已；蘇美與蘇法的關係也正因商業磨擦日趨緊張。雖如此，西歐列強已經逐漸承認蘇聯對於世界大局的重要性。在裁軍會議裏蘇聯代表已經出席了許多年，在一九三一年的歐洲國家聯合會裏也有蘇聯代表，而且蘇聯的經濟互不侵犯公約提議，還曾討論過不少時候；此外蘇聯還參加過國際小麥會議。

然而蘇聯在國際上的情形還是孤立的，這件事實雖於它當時的遠東地位無直接關係，而對於其日後所走的路線——如何突破孤立的處境，終於爭取了平等的地位——卻有極大的決定作用。

在遠東方面，蘇聯的孤立情形可說是更顯著。一直到一九一五年，日本的軍隊才從庫頁島北

部撤退。此外在一九二二至二二年的華盛頓會議裏，雖然以討論遠東的國際關係爲主，蘇聯竟沒有被邀請出席。後來日本指責這次會議時，竟利用這個事實爲藉口，可說是諷刺歷史之至的。

中國在一九二七年與一九二九年後，也與蘇聯斷絕了關係。雖然中國曾於一九三〇年派遣代表團到莫斯科去，而且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還有過一個關於聯合管理中東鐵路的伯力協定，可是在九一八事變發生時，中蘇都還沒有派過正式的外交官吏。

蘇日關係在當年卻比較的和好，日軍自庫頁島北部撤退之後，蘇日邦交立即恢復。在中蘇邦交日趨緊張的時候，日本都保持中立，以致莫洛托夫在那次大會裏報告說：蘇日在政治上沒有衝突，而商業關係也日漸改善。但是八天之後，蘇聯駐日的商務代辦卻遭到襲擊受傷，這時雙方都不願事態擴大。日本政府立即道歉；漁業協定於六月簽字；到九月時，日本更進一步討好蘇聯，貸款給它購買開採油井器材、船隻及港塲設備，與電氣材料等。

第二章 九一八事變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軍侵佔遼寧之後，蘇聯報紙的口吻很可以表示出來其後數月間蘇聯態度的動向。它們除了登載軍事消息之外，還特別提出來幾件事：（一）美國國務院聲明，日軍的行動並不違反凱洛格公約；（二）張學良無意抵抗；（三）用「日內瓦的喜劇」為名，說國聯的六十五屆大會所以召開，祇是與九一八事變在時間上「碰巧湊合上了」；（四）國聯自會向日本交涉解決的方法，而不重視中國。

在九月二十一日的消息報上有一篇特約的文章，把這次事變的歷史背景作了一個綜合的敘述，它說日本不滿於中國情勢的發展，不滿於東北地方當局與南京國民政府接近；不滿於國民政府與歐美列強接近，所以才決定是項行動。「這一個事件乃是中日之間長期衝突的發展過程中的特別尖銳的階段，不過祇從中日關係上來解釋這件事實卻是完全錯誤的。」作者承認，日本

在此時決定採取軍事行動，是遠東國際糾紛的一個新時期的開端，而且雖然在當時歐美列強並無強烈反對之意，而日後日本與列強的衝突必定擴大，有演變為國際嚴重局面的可能。蘇聯政府及人民應當予以密切注意，「因為這是帝國主義者一個新的反蘇行動。」

蘇聯此時的態度可以說是對於各方面都表示懷疑。它懷疑日本的終極目的，中國的不抵抗，以及國聯與英美列強的放縱行爲。認為它們都是為了反蘇，蘇聯報紙的一致結論都是「惟有中國與日本人民大眾的力量才能把這局面改變」。等到有些歐美報紙說，日本應該把東北的全部都加以佔領，不祇佔領南部，然後陳兵於蘇聯邊境，日本的行爲就會更得人諒解，這時蘇聯的懷疑心情自然更加深了。

* * *

但是不久，蘇聯就被捲在中日的糾紛裏。十月十一日蘇聯政府向遼寧日軍當局抗議，日本砲艦在松花江上大量集中，自此以後日蘇之間的信使往還可說是極為頻繁。該月二十八日，日本駐蘇大使廣田訪問蘇聯外長加拉罕於莫斯科，先表示欣慰說自從東北事變發生以來，日蘇邦交極

爲融洽，接着他又說風聞馬占山處有蘇聯顧問並獲有蘇聯軍火接濟，並希望蘇聯不要在中東鐵路沿線增兵，以免引起嚴重事態。第二天蘇外長答覆說一切謠言完全無稽。「蘇聯所採取的乃是嚴格的不干涉政策。這並不是因爲蘇聯欲討好某方或故意令某方感到不快，而是因爲蘇聯尊重它與中國締定的一切條約。」

十一月六日蘇聯國防部長伏羅希洛夫鄭重否認蘇聯集中軍隊的謠傳，他說蘇聯政府對於中日雙方都無意相助，「因爲參加助力的結果都會引起直接干涉，於最後促成中國分裂，損害中國的獨立」。接着他又說一切謠言都是日本故意捏造，令歐美人士以爲日本的侵略東北是爲了「防犯赤禍」。此時蘇聯一般人均認爲歐美列強實在是日本侵華的伙伴，以便更進一步反蘇聯的報紙則一致對國聯的有效制止日本表示悲觀。

此時伏羅希洛夫雖然表示願與日本繼續維持友好關係，而蘇日間的抗議及爭辯文件還是往來不停，十一月十四日加拉罕向日本抗議說東北日軍官的言論有故意挑撥兩國感情之處，同時他提醒日本的諾言，不要侵犯蘇聯在東北的權益。在覆牒裏，日本要求蘇聯嚴守中立，「一如

本在一九二九年對中蘇爭持時的模樣」。而對於這個，李維諾夫卻直截了當的指出來，一九二九年的情形與九一八以後的情形無任何相似之處，「因為在一九二九年衝突停止之後，蘇軍曾立卽撤返蘇境」，接着，李維諾夫又說中東鐵路的情形與南滿鐵路不同，因為中東鐵路係由中國特警負責保護，而鐵路最高當局又是由中蘇雙方代表混合組成的。

在一九三一年底，莫洛托夫向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報告說遠東的糾紛「乃是我們外交政策上的最重要的問題」。對於蘇日關係，他祇輕描淡寫的提了一句，然後他便以國聯為對象極力表示不滿，他說『在阻止「滿洲」軍事行動的發展上，國聯不但表示了沒有能力，而且也沒有熱誠。派遣代表團赴華調查簡直無濟於事，而且還會在此拖延期間令事態益形擴大，這一切都迫使我們在極東邊境上加強警覺，我們切不可忘記「滿洲」是與我們接界的。』

在這一篇演詞發表之前一日，蘇聯曾向日本提議締結一個互不侵犯協定，對於這項提議，日本過了一年才正式答覆。而在此期間，歐美報紙卻紛傳蘇日之間曾訂有關於東北的祕密協定，使塔斯社不得不在一九三二年二月鄭重闢謠。同時日軍勢力逐漸侵入北滿，蘇日的糾纏就愈形紛

繁了。

八

蘇聯一直密切的注意着白俄組織的活動，在中蘇及蘇日的一切條約裏都有這樣一條——雙方均允諾禁止任何有害於對方的團體之活動。在中蘇關係史上這一條款曾被多次引用，在一九二四年以前，蘇聯政府曾向張作霖抗議多次，其後在一九二六年中東鐵路事件及一九二七年北京蘇大使館事件，蘇俄都指控說有白俄人物參加。現在日本軍隊入侵東北之後，白俄更受了庇護與鼓動。日本慫恿白俄在中東鐵路沿線作祟的情形，與第一次歐戰終了外力干涉俄國革命時一樣。

經過蘇聯多次抗爭之後，日本才答應保證制止白俄的活動，但是這時又提出了日蘇之間的另一個麻煩問題——漁權問題。

當日蘇邦交在一九二五年交涉恢復時，日本要求蘇聯絕對保證其在庫頁島上繼續經濟活動及在蘇聯領海上有捕漁的權利。限於當時情形，蘇聯答應了日本這項要求，承認一九〇五年的

樸茨茅斯條約繼續有效。

該項條約的第十條是講漁權的，日本似乎專重這一條的規定，而蘇聯則時時提起其他條款，在一九三二年蘇聯說根據該約第二條日本不能在朝鮮及蘇聯領土接壤之處集中軍隊，根據第三條，日本不能長期在「滿洲」駐兵，然而日本卻一味蠻幹，蘇日關係在此期間緊張情形迄未稍減。該年三月四日消息報刊載了一篇社論，其中它先向中國人民表示同情，並說及蘇聯的嚴守中立的政策，接着便說，詳細分析了當時情勢之後，蘇聯實有積極增強國防之必需，以防犯敵人之進攻，尤其是在遠東一帶國境。

李頓調查團到了遠東之後，蘇日關係還是未見改善，一九三二年四月蘇聯報紙復指責日本故弄玄虛，說有「赤黨活動」，來迷惑李頓調查團的視聽。雖然此時因日軍北進，蘇日關係益趨緊張，中國也在企圖與蘇聯恢復邦交，而蘇聯還是拒絕與李頓調查團合作。國聯的祕書長曾於四月二十日正式向蘇聯提出合作邀請，而李維諾夫卻予以拒絕，其理由是蘇聯沒有代表參加這個代

表團，所以不能對於其未來的結論負責。

事後李維諾夫宣稱，蘇聯所以在當時採取這種態度是爲了兩個理由：一是不相信各參加國家的誠意與政策，二是不預備與日本有武裝衝突。蘇聯不信任國聯可說是由來已久，自國聯中的各大國派兵干涉蘇聯革命時，就已經開始，而蘇聯對於英美的遠東政策則始終表示懷疑。有一個蘇聯作家說：「當時英國政府對於滿洲事件的發展，竟抱着欣幸的心情。他們希望日本被長期的捲在滿洲問題裏，不能再於中國南部及南洋一帶從事活動，因爲在滿洲，英國的投資有限，而在中國其他地區及南洋卻大不相同。英國資本家們很願意看見日本軍人的活動把美國的傳統政策的原則推翻，同時製造一個反蘇的戰場，無疑的反蘇戰爭對於英國資本家們極爲中聽的。」

然而蘇聯的這種國際上的孤立情形，並沒有繼續多久。一九三二年李維諾夫在出席裁軍會議時，第一次提出建議，主張全部裁軍。後來他改主部份裁軍，最後則接受了美國的建議案。同時他便同西歐的國家儘量多訂互不侵犯協定，甚至法國都接受了一個。

至於第二個理由，蘇聯已經見到了中國尚在忙於內戰，無意於抗戰，而淞滬停戰協定也明白

的指出英美對於日本的袒護態度。令蘇聯單獨強硬對付日本，它自是不肯的。此外遠東紅軍總部雖然成立於一九二九年，可是它卻沒有可供作戰的物資在它的附近。第一次五年計劃尚未完成，即使完成了，工業化的範圍也祇有中亞細亞一帶，遠東還談不上。而在內政方面蘇聯的情形也尚未鞏固，一九三一年及一九三二年蘇聯接連着歉收，而托派的活動及齊維諾夫等人的叛國行爲也剛才肅清。無論在經濟上與政治上蘇聯都沒有甘冒對日作戰危險的可能。

結果蘇聯便採取了願意同日本與中國都進行交涉的政策。在一九三二年底蘇日之間簽訂了兩個商業協定，一個是把蘇聯石油供給日本，另一個使蘇聯向日本購買種種物資及器材。更重要的是把漁業懸案也暫時予以解決。

在中蘇關係方面，中國自一九二七年以後第一次企圖與蘇聯接近。有些學者認為中國的這一個行動乃是失望於國聯之後，力求盟友的表現。伯力協定之後中國的代表團本已在一九三〇年五月就到莫斯科，可是正式談判到十月才開始，可是由於種種原因，這個談判拖延了近三年之久，到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中蘇邦交才宣告恢復，而許多其它問題還沒有解決，中蘇邦交恢

復之後，日本當然眼紅，它的報紙普遍的喊稱，「赤禍」的危險越來越大了。日本當時外相內田曾有一篇極盡煽惑的演說，引使蘇聯對日提出一個嚴重的抗議。

李頓調查團的報告書發表於一九三二年十月，在其結論部份裏，它說：

『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接着是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及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的蘇聯政府宣言，談到蘇聯對中國人民的政策；後來又有一九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及同年九月二十日的中蘇協定，這些都粉碎了蘇日之間在滿洲相互瞭解及合作的基礎。這種基本政策上的轉變把中蘇日三國之間的關係全盤改觀。此外各盟國在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年間的武力干涉及其後蘇日兩國在一九二〇——一九二二年間在西伯利亞的衝突都加強了蘇日關係之改變。』

『基於蘇聯政府的態度及第三國際所採的反對一切與中國締結不平等條約諸歐美列強的政策，蘇聯很可能會支持中國從事鬪爭以恢復其主權。上述種種情勢均使日本懷疑蘇聯之用